

# 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引入和发展的路径

林顺利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民国时期社会工作自西方教会组织引入与推展后,形成了社会工作实务、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三条线路并进的局面;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改设“社会部”并在地方设置分支机构,由政府统辖社会工作组织管理,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系统机制的雏形。

**关键词:**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历史脉络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3)03-0034-05

无论是作为一项社会事业,亦或一门学科,现代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工作源于西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东西方的慈善事业和社会救济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却是以工业革命以及其引发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国内民族工业的兴起推动中国开始了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开始了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系统的对西方的模仿和借鉴。社会工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引入的。在《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一书中,彭秀良认为“她跟随者基督教青年会的脚步来到中国”<sup>[1]</sup>,也就是说,最初的社会工作是由西方的传教和慈善活动带进中国的。在这之后,由于这一专业的理念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应对当时凸显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很快就被当时的一些社会组织以及一些带有改良色彩的社会运动所借鉴和运用,同时也被纳入到当时的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之中。伴随着“国民政府”的社会治理意识加强以及抗战时期的特殊需要,1938年8月,民众训练部改组为“社会部”,开始由政府介入组织社会事业的开展。

## 一、西方教会组织的引入与推展

西方宗教组织在中国的传教历史由来已久。

但鸦片战争以后,这种传教活动就带有了明显的“文化殖民”的政治目的。辩证地评价这种传教活动,一方面,以基督教为首的宗教传播无疑是为了配合西方列强的军事和经济侵略,属于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开拓殖民地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这种传教活动所附带的文化和技术传播客观上也有利于相对落后的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在中华续行委办会编撰的《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以及相关的史料中,把教会活动分为促进事业、教会事业、宣教事业、布道事业、教育事业、社会事业、文字事业、联合事业、学生事业、青年事业,其中社会事业属于教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服务内容上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慈善救济。对于教会而言,慈善救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教众内部的救济和抚恤;另一类是针对贫民和弱势群体的救济和抚恤。比如,当时在北平比较活跃的“救世军”和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就曾积极从事“收抚幼童和开设粥厂、暖厂”等慈善救济活动<sup>[2]</sup><sup>121</sup>。在许仕廉主编的《社会学界》第七卷中,张金陵的《北平粥厂之研究》一文中的附表资料显示,1931—1932年救世军在北平开设粥厂7个<sup>[3]</sup>。除此之外,慈善救济活动还包括衣服与医疗机构的特殊疾病救治,比如1891年开始在国外教会医院协助下建立的分布在东南沿海省份的“麻风医院”<sup>[4]</sup><sup>328-329</sup>。

收稿日期:2013-01-10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展研究》(HB13SH040)

作者简介:林顺利(1978—),男,河北徐水人,法学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史、福利社会学。

第二类,社会改良。社会改良是基督教为首的教会组织进入中国以后,针对当时落后低下的国民素质和社会风气所进行的社会建设活动。如王治心在《中国基督教史纲》里谈到,中国当时一切社会恶习,无论烟酒嫖赌等不良嗜好,还是风水星相、偶像鬼神等迷信和崇拜,都是基督教极端注意并竭力反对的<sup>[4]344</sup>。为此,当时的基督教会采取了包括宣传教育、成立互诫组织、医疗介入等多种形式。为了改变中国女性的弱势地位,1916年成立的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确定了“促进女子德智体群四育,互相服务,改良社会”的宗旨,并力求在妇女、儿童、家庭、卫生、慈善等方面提供社会服务<sup>[2]131-132</sup>。除此之外,基督教还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有力地促进了乡村的移风易俗,尤其是平民教育和农业发展。比如先行者基督教传教士贾尔森(Arthur. L. Garson)、胡本德(Huge. W. Hubbard),以及后来的“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等组织的乡村建设实验,都带有社会改良的性质和目标<sup>[5]</sup>。

第三类,大众教育。从1923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编撰的《中华基督教会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的《本刊宣言》来看,基督教会为首的教会组织对中国本土的教育事业可谓“不遗余力”,仅1831年到1920年的90年间,由教会兴办的各级学校就达到了7382所,学生214254人。这种“不遗余力”背后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侵略和布道的目的,但客观上也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思想、理念、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从专业视角来看,教会提供的教育服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体制内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教育,包括神学院、医学院等专科院校;另一部分则是在城乡社区开办的“夜校”“平民识字班”“妇女编织班”等社区教育形式,也包括以城乡社区和特定人群为对象的演讲、文字材料等宣传教育活动。后者为社区工作的专业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后来的“乡村建设”积累了经验。

总的来看,社会工作引入初期,基督教为首的教会组织及其活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为后续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本土化(包括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尽管教会的“社会事业”服务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教色彩,但其凸显的社会工作理念和手法的专业性已经初见端倪;同时,由于中国本

土处于一种“后发”的地位,在引入伊始,实际上就和当时的西方社会工作发展保持了一种大致同步的状态。

## 二、社工实务、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三线推进”

社会工作引入并纳入本土高等教育体系之中,并且使之成为一门专业的过程,是与基督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相当多的文献资料中,都提到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中国的一个关键人物——John Stewart Burgess(中文名“步济时”)。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的高材生,1909年从美国来到中国,为基督教青年会积极筹划了大量的社会服务项目和组织,包括学生社会服务俱乐部、社区理事会联盟、产科协会、监狱罪犯援助协会、妇女解放委员会等。1917年,步济时在燕京大学创立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29年,他一直主持社会学系的工作<sup>[6]</sup>。从一定意义上讲,步济时对社会工作的贡献是综合的,既包括社工实务,也包括社工教育和社工研究(步济时本人是一名专业人士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可以由他本人的专业背景以及在北平青年会编辑的《北平社会服务研究》发表的《社会工作方法》和《怎样研究人力车夫》两篇文章得到佐证<sup>[2]138</sup>)。由此也就开启了民国时期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在“实务”“教育”和“科研”三条线路上推进的先河。

### (一) 社会工作实务

从广义的社会工作角度来讲,民国初期的“实务”工作主要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慈善和社会救济活动,一部分是基于社会改良目的的道德和行为的教育活动,一部分属于带有实验性质的综合的社区和乡村建设工作。这些工作中,一部分属于广义的社会工作,尤其是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比如社会救济、赈灾、医疗和卫生服务等;另一部分接近或者属于狭义的专业社会工作范畴,比如:平民教育属于社区教育范畴,乡村建设运动属于社区工作或者社区发展范畴,一些互诫和妇女组织的活动项目则带有“小组工作”的性质,而类似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开展的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则带有一些“个案”的特征。

从当时一些机构开展的社会工作来看,已经

基本上形成了相对规范的流程。比如,1932年“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书“家庭工作股个案工作报告”部分就有这样的记载,“本年度共办理新旧案一百七十一件……如已结束之个案发生问题时,仍可来会请求重理。本会成立经年,渐为社会所闻之,故本年度自请求助者较往年为多”<sup>[7]61</sup>。从其报告和所附案例来看,从接案到结案,不仅工作手法与传统救济方式不同,而且已经显示出科学性,管理和服务流程也相当规范。尽管这样划分会流于机械,但总的来说当时的社会工作实务在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展,也逐渐被纳入经世致用的“应用社会科学”范畴。

## (二)专业教育

步济时创办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后,1925年又将该系改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于1926年成立研究院,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紧随其后,其他一些教会学校如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等,也纷纷开设社会工作专业。至此,国内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体制在高校层面步入正轨。从许仕廉主编的《社会学界》上发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年度报告来看,当时的专业教育,尽管和社会学的课程交叉较多,但无论从理论课程的知识体系还是实习实践教学安排,都已经相对完善。《社会学界》第三卷(1929年)许仕廉的《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其步骤》一文,分析了“建设时期”的国情需求和中美两国社会工作的差异,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教育理念<sup>[8]175-181</sup>。笔者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努力扩大社会学(含社会工作)专业的影响,为专业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许仕廉认为,发展社会学不仅仅是大学的责任,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第二,强调通才教育。“所谓周到,就是学社会学的人不要太专门……对于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社会问题、社会调查、社会统计、乡村社会学、贫穷学、犯罪学、地方服务、个案服务、工业服务等要稍有根底”<sup>[8]177</sup>。第三,强调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教学方案设置。“我们教书的要点,是要利用一种方法,使每个人都能得到相当指导,发挥其长。”<sup>[6]221</sup>第四,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大学教员学生应重视研究工作,研究范围随时随地随教授范围而定。”<sup>[7]61</sup>第五,社会工作专业要注重实习。许仕廉专门指出关于实习的三种形式:一是大学课程要设置“社

会机关参观课程”;二是在社会上设置“大学实习处”;三是要将学生送出去,包括日本、天津、上海的各大工厂,北平各慈善及社会机关<sup>[8]181</sup>。许仕廉的教学理念及策略,代表了当时专业教育发展的成就,即使放到今天,也丝毫不过时。

## (三)学术研究与知识体系的本土化尝试

跟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相交叉,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从社会调查开始的。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工作主要有三股力量在做:一是宗教和民间组织,包括从属于这些组织的传教士与学者,比如步济时的“社会实进会”,把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二是高校学者和科研机构,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界》就先后发表了多篇社会调查成果,再比如的李景汉的“定县调查”。1926年,受美国应用社会学的影响,北平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成立过“社会调查所”<sup>[2]139</sup>。三是当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所做的一些常规的调查和统计工作。在社会调查基础上,为推进社会工作实务和社会工作教育的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比如步济时的《社会工作方法》《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一些关于“个案工作”“妇女工作”“儿童工作”“农村工作”等具体的社会工作领域和方法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比较突出的就是围绕乡村建设开展的大讨论。

蒋旨昂在1946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一书中曾感慨:“(民国)三十三年七月间,作者参加社会部所召集的大学社会行政课程讨论会,八月初又参加了教育部所召集的文法师范等学院各系课程……均曾深感,社会工作的意义,尚未获得国学者之一致的了解;即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及实施者,亦因所见不同,而所用名词各异。”<sup>[9]</sup>从更宏观的学术背景来看,当时的社会科学界重点探讨的是对国情的判断、对社会问题的解析和寻求治国良方三个方面,社会工作研究实际上从属于这一大的学术框架。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有孙本文、萨孟武、朱亦松等人的社会问题研究;祁森煊、李剑华、言心哲等人的“社会事业”研究;何海鸣、朱亦松的“社会政策”研究。其中蒋旨昂1946年出版的《社会工作导论》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构建的一种尝试。该书力图澄清社会工作基本概念,并且搭建了一个基于本土国情的,由社会工作研究、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组织、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组成的系统的社会工作知

识体系。尽管该时期的学术研究颇丰,但整体来看,由于引入时间较短,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业,其自身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与实务的本土化研究在当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 三、政府的介入与社会工作系统化的雏形

民国初期,政府对社会事业的介入主要是社会救济和一些特殊人群的社会保障。比如在蔡勤禹的《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一书中,将国家主持的社会救济分为“灾民救济、难民救济、城镇失业救济、不幸妇女的救济、安老恤残与特殊儿童救济”五个部分<sup>[10]</sup>。在局势相对稳定时期,政府主导社会事业,主要以救济为主;在局势动荡、政府难以兼顾的情况下,宗教和民间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1940年南京政府改设“社会部”,才有了一些带有“专业”性质的改变。1941年公布的《社会部公报》第一期中,“社会部组织法”规定,社会部“管理全国社会行政事务”,下设总务司、组织训练司、社会福利司、合作事业管理局四个机构,其中社会福利司专管“关于社会保险之指导实施事项”“关于劳动者生活之改良事项”“关于社会服务之倡导和管理事项”“关于日常生活费用指数之调查统计事项”“关于职业介绍之指导协助事项”“关于贫苦老弱残废等之收容教养事项”和“其他有关社会福利事项”<sup>[11]</sup>。如此明确的职能分工,已经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救济,开始带有现代社会服务的特征了。

与南京政府相对应,地方分设“社会处”,负责地方社会行政和社会事业管理工作。从1946年山西省社会处编撰的《山西省社政工作概况》来看,地方社会处的职能主要包括一般社会行政、民众组训、社会运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义务劳动六个部分<sup>[12]</sup>。山西省社会处的职能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山西省的社会处已经广泛开展人民团体登记管理;第二,在“社会福利”职能中积极开展“筹设并整理社会服务机构”的项目;第三,开设并直接管理包括“社会服务处”“山西省救济院”和“山西省育婴院”这样的直属社会服务和福利机构。这就意味着,政府介入已经开始从最早的单纯的社会救济逐渐过渡到与“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规划和管理社会工作的阶段。

作为最直接的证据,1945年第17期社会部公报发布的“考试院”公告《特种考试社会工作人员考试规则》,将社会工作资格认证分成“甲级社会工作人员”和“乙级社会工作人员”两种<sup>[13]</sup>。而1948年《社会建设》第一卷第四期刊登的《社会部南京伤残重建院组织规程》“第三条”之“第五组”明确规定:(在职人员)必须“掌握个案调查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及随访并心理测验精神病社会工作等事项”<sup>[14]</sup>。可见,尽管当时南京政府的“社会部”在战争影响下工作并未全面推展,但至少已经开始尝试将“社会工作”作为科学的专业技术纳入到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事业体制中,并激发了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萌芽。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民国中后期尤其是“社会部”及其地方分支机构成立并承担全国社会行政管理职能后的中国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框架:首先,在横向层面,社会工作实务经历了教会组织引入并传播、本土民间组织传承和借鉴、政府介入和纳入体制三个阶段,也开始与学术研究机制、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教育、培养机制、政府主导的职业水平评价和资格认证体制相融合。其次,纵向层面,自上而下管理体系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包括:(1)直属中央行政院的“社会部”和地方分支机构(社会处);(2)政府办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机构,如救济院、育婴院等;(3)民间非政府组织,包括教会组织和本土社会服务组织兴办的社会服务机构和社会服务项目。综合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在民国时期不足30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一种系统化的趋势,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征已经初见端倪。

#### [参 考 文 献]

- [1] 彭秀良. 守望与开新——近代中国的社会工作[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1.
- [2] 左芙蓉. 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M]. 成都:巴蜀书社,2009.
- [3] 张金陔. 北平粥厂之研究[J]. 社会学界,1933(7): 189—222.
- [4] 王治心. 中国基督教史纲[M].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
- [5] 刘家峰. 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4—5.

- [6] RISEDORPH KIMBERLY ANN.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M]. Washington University. Ph. D. 1994:220.
- [7] 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 北平家庭福利协济会报告书[Z]. 1932.
- [8] 许仕廉. 建设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其步骤[J]. 社会学界, 1929(3):175-182.
- [9] 蒋旨昂. 社会工作导论[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1.
- [10] 蔡勤禹. 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29[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122-189.
- [11] 社会部总务司. 社会部公告(1941年第1期)[DB/OL]. 北京: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www.nlc.gov.cn/>.
- [12] 山西省社会处. 山西省社政工作概况[Z]. 1946.
- [13] 社会部. 社会部南京伤残重建院组织规程[J]. 社会建设, 1948(4):1-2.
- [14] 社会部总务司. 社会部公告(1945年第17期)[DB/OL]. 北京: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http://www.nlc.gov.cn/>.

[责任编辑 郭玲]

## On the Historic Venation of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during the Republican of China Era

LIN Shun-li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and start by western Church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of China, social work in China had developed in three ways: practic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Until the social department and its branches were set in Nanjing KMT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were brought into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primary of modern systematic mechanism of local social work had been shaped.

**Key words:** the Republican of China; social work; historic venation